

总裁 / 社长 / 副社长

《言论》版欢迎读者来信。来稿时请随同信件附上真实中、英姓名、英文通讯地址以及电话号码。传真：6319-8118 电邮：zbyanlun@sph.com.sg

陈英杰 新报业媒体总裁
李慧玲 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罗文燕 华文媒体集团副社长
韩咏梅 华文媒体集团副社长

言论

总编辑 / 副总编辑

吴新迪 总编辑
洪奕婷 副总编辑
韩咏梅 副总编辑
郭思满 副总编辑
郭文雁 副总编辑
兼副刊主任
谭德婷 副总编辑
郭丽娟 副总编辑
黄慧敏 副总编辑

新闻主任

何惜薇 政治新闻主任
邹美琳 本地新闻主任
杨丹旭 中国新闻主任
吴汉钧 国际新闻主任
沈越 财经新闻主任
杨全龙 体育新闻主任

赖婉丽 娱乐新闻主任
叶鹏飞 言论主任
周殊钦 多媒体编辑主任
陈聪明 视觉主任
李天钧 摄影主任
林上德 摄像主任

王舒杨 影音群主任
黄子琛 音频主任
刘力智 剪辑主任
宋以彬 数码编辑主任
沈茂华 数码编辑副主任
杨萌 受众策略主任



关于我们

棱镜)叙事

“非洲新加坡”卢旺达的地理想象和实践

肖海

如果检索“非洲的新加坡”，最先看到的往往是东非内陆小国卢旺达。但事实上，提出类似发展愿景的不止卢旺达。战略要地吉布提、旅游岛国毛里求斯，分别在2014年和2017年公开表达过打造“非洲新加坡”的发展定位。鉴于地缘位置与国家体量，这些非洲小国的设想尚属情理之中。然而，近年来诸如肯尼亚、加纳等区域大国也开始提出具有“新加坡色彩”的发展道路，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新加坡模式”正逐渐被非洲国家所了解，并视为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范式。

在所有自我定位为“非洲新加坡”的国家中，卢旺达与新加坡的客观相似性反而极为有限，发展前景可谓任重道远：既不具备突出的战略区位，也缺乏关键性战略资源；约七成国民仍生活在农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尚不足新加坡的2%；在国际舆论中，卢旺达国家形象长期与“种族大屠杀”的历史阴影相伴。究竟为何这样一个先天条件并不占优的国家，会长期被冠以“非洲新加坡”的标签，并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将领导人卡加梅的宏大愿景付诸实践？

2010年卢旺达总统大选期间，卡加梅首次公开提出，要把卢旺达建设成下一个“新加坡”。这一表态迅速被本地媒体以及欧美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普遍认为这一雄心过于理想化，甚至不现实。然而，在政治强人主导、威权治理框架下的卢旺达，确实展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变化。尽管在诸多方面并未、也不可能复制新加坡的发展路径——这一点包括卡加梅可能都心知肚明。但自那之后，卢旺达长期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并屡次被国际媒体和机构评为非洲最佳旅游目的地、非洲最廉洁国家等。首都基加利（Kigali）也频频获得非洲最干净

过去20年间，新加坡的规划咨询公司曾为10多个非洲城市制定总体规划，但只有在基加利，这些规划得到相对系统而持续地落实。这当然不仅是“照图施工”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一种对未来的信心与决心。

城市、非洲会展旅游之都等称号，成为卢旺达形象转变最直观的窗口。

战争弹孔成为国家记忆一部分

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震惊世界：原本共享语言和文化的群体，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依社会经济地位被人为区分成胡图人与图西人，数十年的结构性对立与仇恨，最终演变为大规模、极端残忍的屠杀。基加利战斗留下的弹孔，至今仍镶嵌在卢旺达议会大楼的墙体之上，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在悲剧发生之前和过程中，卢旺达几乎被国际社会忽视；悲剧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持续的污名化，以及对社会秩序和治理能力的广泛质疑。国家重建由此展开，过程漫长而艰难。

新加坡与卢旺达之间仍存在本质性差异。新加坡是典型城市国家，国家治理与城市治理高度重合、相互支撑；国家可以集中资源和政策推动单一城市的发展，无须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复杂的协调与平衡，而城市的快速、可持续增长，又反过来强化国家对资本与人才的吸引力。卢旺达并不具备这样的结构性条件。基加利人口仅占全国约13%，城市面积更只占全国土地的2.7%。在这样的格局下，城市化如何服务于整体国家发展，必须通过高度自觉的制度设计来实现。这也正是卡加梅政府在邀请新加坡盛裕集团（Surbana Jurong）参与城市规划之外，更为深层的治理考量。

从实践来看，卢旺达过去十余年的发展经验，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城市耦合”模

式。基加利的规划与发展，本质上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但在操作层面，市政府始终扮演前台角色，与国际社会广泛互动，并在跨部门协调中逐步推动规划落地。

不断加码制度竞争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资源高度向基加利倾斜，二线城市与农村地区直到近年才被系统性纳入规划议程。正因如此，基加利整洁的城市环境、良好的公共秩序以及便捷的移动互联网，在非洲城市中显得格外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新加坡土地面积相当的基加利，才是“非洲新加坡”这一愿景真正的承载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加利正在模仿甚至试图赶超新加坡。在卢旺达中下层公务员群体中，新加坡更多只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参照；相比之下，他们更清楚的是：基加利的城市规划由新加坡团队完成，因为这份规划一直就陈列在市政厅一楼大厅。公务员日常谈论城市发展时，往往更倾向于将基加利与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等东非城市作比较。

一位卢旺达主权基金经理曾对笔者说：“你知道吗，在卢旺达注册一家公司，六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审批，是非洲第二快的，仅次于毛里求斯。”正是以这个同样自称“非洲新加坡”的岛国为参照，卢旺达不断加码制度竞争；2020年成立的基加利国际金融中心，正是着眼于与毛里求斯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除了区域层面的竞争，跨区域多边主义合作，同样构成卢旺达实践“非洲新加坡”愿景的重要路

径。新加坡在亚洲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位置；卢旺达无法复制这一条件，但不妨碍它通过制度设计来塑造枢纽的“地理想象”。例如，在智慧城市与数码化发展领域，卢旺达牵头联合37个非洲国家成立“智慧非洲联盟”，总部设于基加利，卡加梅亲任主席。借助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搭建的金融科技合作平台，卢旺达与加纳签署非洲首个跨境支付协议。

在基加利的城市空间中，人们既能看到新加坡制定的城市规划与电子政务系统，也能看到中国参与建设的公共和私营建筑、卡塔尔投资运营的新机场、土耳其承建的国家体育场、韩国电信铺设的光纤网络，以及由德国、荷兰、比利时发展机构主导的智慧城市项目。正是这种高度多边化的合作网络，使基加利在短时间内焕然一新，也成为卢旺达重新嵌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方式。

过去20年间，新加坡的规划咨询公司曾为10多个非洲城市制定总体规划，但只有在基加利，这些规划得到相对系统而持续地落实。这当然不仅是“照图施工”的结果——其间必然经历无数细致、反复的调整与博弈——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一种对未来的信心与决心。

在与数十位卢旺达中下层公务员的交流中，笔者感受到颇为特殊的一个现象：几乎所有人都能用流利英语交流。要知道，卢旺达1962年从比利时独立后一直是法语国家，直到2003年才将英文列为官方语言，2008年才设为学校必修科目。行政体系在短短10余年内呈现出的这种转变，令人印象深刻。一位50多岁内政部中级官员在回顾过去30年的国家变化时，将这一切归结为一个词：政治决心。他说，他指的不仅是领导人的决心，更包括他自己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助理教授

吴俊刚)专栏

加拿大的“特朗普梦魇”

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20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的特别演讲，赢得世界的掌声。加拿大终于挺起腰杆，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断施压、恫吓和嘲讽，不再弯腰屈膝、跪地求饶，而是勇于另谋出路。

卡尼在演讲中没有直接点名，但处处剑指美国和特朗普。他所传达的信息很清楚，超级强权破坏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已经死亡，世界各国必须建立新的联盟，以对抗世界大国的施压和恐吓。卡尼还特别挑明，中等国家须加强合作，应对大国的胁迫。

加拿大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特朗普梦魇”。恶梦其实打从前总理特鲁多时代就已开始，特朗普几乎是不把特鲁多放在眼里，不断在各种公开场合奚落他，称他为州长，并声称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的第51州。

特朗普之所以如此看不起加拿大，根本原因之一，是加国的出口高达七成依赖美国市场。这是个致命弱点，近乎所谓的买方垄断，所以特朗普可以通过加征进口关税要挟。然而，发生这样的事，也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加拿大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因为长期以来，加拿大对美国马首是瞻，奉为自由世界的大大哥，经济上则是唇齿相依的邻国。然而，强大的依靠转瞬即变成霸凌。

早在1988年，美加就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在这个基础上，于1990年代加入墨西哥，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厂家（如汽车零部件）因利趁便，把生产线转移到加墨两国，然后再把成品运回美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这一来也令许多美国工人丢掉饭碗。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后，就一直批评北美自贸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这导致三国重新谈判，并于2018年签订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现在，特朗普又觉得协定对美国不好，必须再次谈判调整。加墨两国只能徒感无奈。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全世界发起关税战，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只能幸免，还首当其冲。这期间，加拿大换了总理，卡尼接替特鲁多，于是开始“特卡”之间的恩怨情仇。面对特朗普的咄咄逼人，卡尼不但不肯屈服，还经常强硬回怼。在达沃斯的那场演说，直指美国霸道，可说是公然跟特朗普叫板。对特朗普而言，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卡尼抢在特朗普之前发表演讲，显然也大煞风景，让特朗普面上无光。因此，两人在达沃斯并没有会面，直到回国后才通上电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事后对美国媒体说，卡尼在电话中“收回他在达沃斯发表的一些不当言论”。但卡尼马上否认，表明自己说话算话，直接打脸试图为特朗普挽回面子的贝森特。

可以想见，特朗普有一肚子怨气，因此，接连找机会发难，包括撤消发给加拿大加入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在卡尼访问中国并与中方达成多项经贸共识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特朗普马上就撂下狠话，称若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将把加拿大商品征收100%的关税。

特朗普似乎对加拿大存有某种特别的厌恶感，也许他觉得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沙包，也许他真以为加拿大只能逆来顺受，不敢还手。这看来已把加拿大逼到墙角。

此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边受访时已警告卡尼，加拿大寻求跟中国修补关系，肯定会影响美加之间的谈判。美墨加三国今年将重新审查及修订在特朗普首个任内签订的美墨加协议。英国首相斯塔默紧接着带团访华，特朗普同样也警告他不要和中国开展商业合作，称这“非常危险”，而加拿大和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则更加危险。这简直就是帝国主义的口吻，俨然把加拿大和英国当成附庸国，真是霸道之极。

特朗普声称，他将于今年4月访华，但中方迄今并未证实此事。现在他如此大张旗鼓，警告加拿大和英国不要和中国开展经贸关系，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确实叫人摸不着头脑，相信中方心里一定也在嘀咕：你将来我们家做客，却不断威胁我们的其他客人，这是哪门子的外交逻辑？

特朗普对加拿大的挤压和霸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新的动作，是警告加拿大，若不立即解决对美国湾流宇航公司（Gulfstream Aerospace Corp）多款喷气式公务机的许可问题，美国将向销往美国的加拿大制造飞机庞巴迪（Bombardier）征收50%的关税，并取消庞巴迪环球快线（Bombardier Global Express）系列飞机以及所有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特朗普指加拿大“错误地、非法地、顽固地拒绝”认证湾流公司的飞机。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又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自去年4月以来，加拿大分离主义团体“艾伯特繁荣计划”（Alberta Prosperity Project）的领导者，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见了三次面。该组织正寻求下月再度与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官员会面，就艾伯特省“独立”后过渡阶段所需的5000亿美元信贷额度支持展开磋商。看来，加拿大的特朗普梦魇还长着呢。对此，卡尼已发出警告，要美方尊重加拿大的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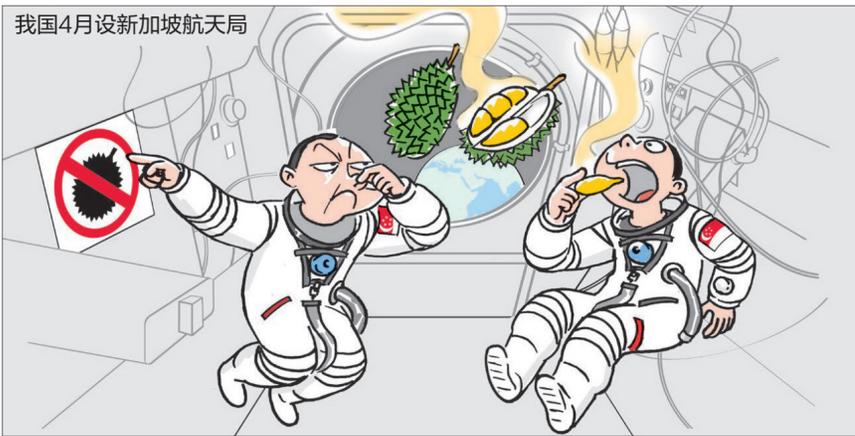
最可笑的是，特朗普还说，加拿大是靠美国才活下来的。换言之，美国随时随地可以按下让加拿大活不下去的按钮。新加坡人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和霸凌，也许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有过类似经历。若干年前，一位已故的邻国领袖就曾指着地图上的新加坡说，你们就只是地图上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小红点。

特朗普似乎对加拿大存有某种特别的厌恶感，他对加国的种种指责，包括让毒品流入美国等等，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许他觉得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沙包，也许他真以为加拿大只能逆来顺受，不敢还手。这看来已把加拿大逼到墙角。

无论如何，加拿大这种受强邻霸凌的经历，给众多中小国家提供重要的警示：首先，不能过度依赖单一大国的市场；其次，须防范强邻随时变脸成霸凌；其三，必须加紧与其他国家合作，分散风险；其四，反大国霸凌应该成为众多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轴。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早报)漫画 张进培



新移民如何重塑新加坡科技与融合型经济

白士洋 石建政

在新加坡的科技版图上，一种并不张扬却持续生长的力量正在形成。它既不是单一资本集团的扩张，也不是纯粹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一群新移民创业者、科技工作者与文化社群，在人工智能（AI）与数码经济浪潮中，逐步构建起一种融合型创新生态。

如果说，晋商代表的是历史悠久的商业文明传统——重信用、善结缘、懂协作、重长期主义，当代新移民创业者，则是在数码时代以另一种形式延续这种精神。他们不再依靠票号和商路，而是通过算法、平台、数据与跨国数码网络，参与全球技术体系的重构。新加坡正成为这种转型的重要承载空间。

近年来，在新加坡的AI创业与科技产业中，越来越多新移民群体活跃在算法研发、金融科技、企业数码化、医疗AI、智能制造等领域。他们既是技术生产者，也是市场连接者。一方面，他们将中国、东南亚与全球市场的应用场景，引入本地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又通过新加坡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与国际连通性，将本地技术成果推向区域与全球市场。这种“双向嵌入”的创业模式，使新加坡的科技生态不只是技术集群，更逐渐形成跨文化、跨市场的创新枢纽。

与传统“移民经济”模式不同，当代新移民参与的不只是劳动力补充，而是知识型资本、技术型资本与网络型资本的输入。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人力资源，而是创业方法论、工程能力、产业理解和跨体系协同能力。这使得新加坡在发展AI与深科技产业时，不是简单依赖大型企业或政府主导项目，也是逐步形成一种由中小型科技创业团队、专业社群组织和跨文化网络共同构成的分布式创新生态。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融合并非被动适应，而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部分。许多新移民创业者以双文化、双语境、双市场的身份优势，构建跨体系协作能力。他们既理解亚洲市场的应用逻辑，也熟悉国际资本与制度语言；既能对接本地政策体系，也能链接中国、东南亚及全球产业链。这种中角色，正是新加坡作为全球科技枢纽的重要软实力来源。

晋商文化所强调的“义利并重”“群体协作”“信任机制”，在今天的新移民科技社群中，以现代形式重新出现——不是宗族网络，而是创业社群、行业组织、科技社团与跨界平台；不是票号体

系，而是数据网络、资本平台与技术生态。商业伦理从传统诚信转化为技术信任，从人际信用转化为制度信用与系统信用。

更重要的是，这种新移民主导的科技创业生态，并未与本地社会形成割裂。相反，它逐步融入社区结构、教育体系与产业生态之中，参与本地人才培养、支持科研转化、推动中小企业数码化升级、参与公共科技项目建设。技术发展不再是“外来精英工程”，而逐步转化为本地多元经济结构的一部分。

重塑中新之间合作逻辑

从宏观层面看，这也正在重塑中新之间的合作逻辑。过去的中新合作，更多体现为政府项目与大型企业对接，而当下正在形成一种“民间科技网络连接”，由创业者、工程师、科研人员、投资人和产业组织构成的跨国协作网络。这种连接更具灵活性、市场适应性与技术导向性，使中新关系不仅停留在贸易与投资层面，也进入技术共创、创新共建、人才共育的新阶段。

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的独特优势，在于制度稳定与环境开放。当新移民的创业活力、技术能力与文化网络不断嵌入其中，AI发展便不只是科技升级工程，而逐渐演变为一种融合型经济发展模式：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文化融合提升系统韧性，多元结构增强国际连接能力。

从历史晋商到当代AI创业者，从传统商路到数码网络，从商帮文化到科技社群，新移民群体所代表的并不是“外来力量”，而是一种结构性共建力量。他们既改变着新加坡的科技产业结构，也参与塑造这个城市国家未来的社会形态——一个以多元文化为底色、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全球连接为方向的融合型发展模型。

这或许正是新加坡在全球AI竞争格局中的独特路径，不是单纯依靠技术规模优势，而是通过新移民融合经济+创业型科技生态+跨文化创新网络，形成一种具有高度适应性及扩展性的创新体系。这种模式，也正在成为中新之间新的连接方式，不只是国家之间的合作，更是社会之间的协同，文明之间的共创。

作者白士洋是南洋大学校友学术会顾问
与新加坡社科大学客座教授
石建政是新加坡社科大学客座讲师
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